

# “80后”，当今购书主力军

本报记者 李贞

## “80后”成为购书主力

有玩笑称，现代人生存的四大要素是“阳光、空气、水和WiFi”。印象中，在这个数字化的年代，人们似乎在越来越倾向于电子化的阅读。然而，近期的一些读书调查结果，则可能会改变这一看法。据第十三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我国纸质书阅读率正回暖。在2015年，我国成年国民纸质图书阅读率为58.4%，较2014年的58.0%上升了0.4个百分点；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的阅读量为4.58本，与2014年相比增加了0.02本；有57.5%的成年国民更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更让人意外的是，在愿意购买纸质书的人群中，“80后”已然成为绝对主力。记者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随机访问了20位购书市民，发现其中七成是“80后”。

除了在实体店购书，在通过网络购书的人群中，“80后”也是主力。当当网发布的十年国民图书消费报告中称，在过去十年中，“80后”的图书消费量分别是“90后”的54倍、“70后”的9倍、“60后”的169倍，呈现出数量级的差异。对此，当当副总裁、出版物事业部总经理陈立均表示，这一数据并不意味着其它年龄段不阅读，只是不同年代的主流阅读路径存有差异。不过，这一调查确实反映了一定层面上反映了已过而立之年的“80后”，不仅已经成为社会各领域的中流砥柱，在阅读来实现自我提升的方面，也成为各年龄段的表率。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利用大量时间读书显然已经成为奢侈，取而代之的是合理利用“碎片时间”，这一点上“80后”也做得不错。调查显示，在阅读的时间上，睡前、工作休息间隙和节假日是大多数现代人的高峰阅读时段。其中睡前是阅读的最高峰，超过80%的人都会在睡前阅读。而“80后”利用“碎片时间”进行阅读的比例最高，其中，选择在上下班或上下学路上阅读的“80后”近四成，远高于其他年龄段。

## “80后”购书注重品质

调查表明，“80后”或是更加注重阅读品质的一代人。据当当网调查，许多“80后”“重视阅读舒适度和排版美感”。即使是在阅读电子书群时，也是爱付费购买更加精致字体的群体，其购买字体的比例远超其他年龄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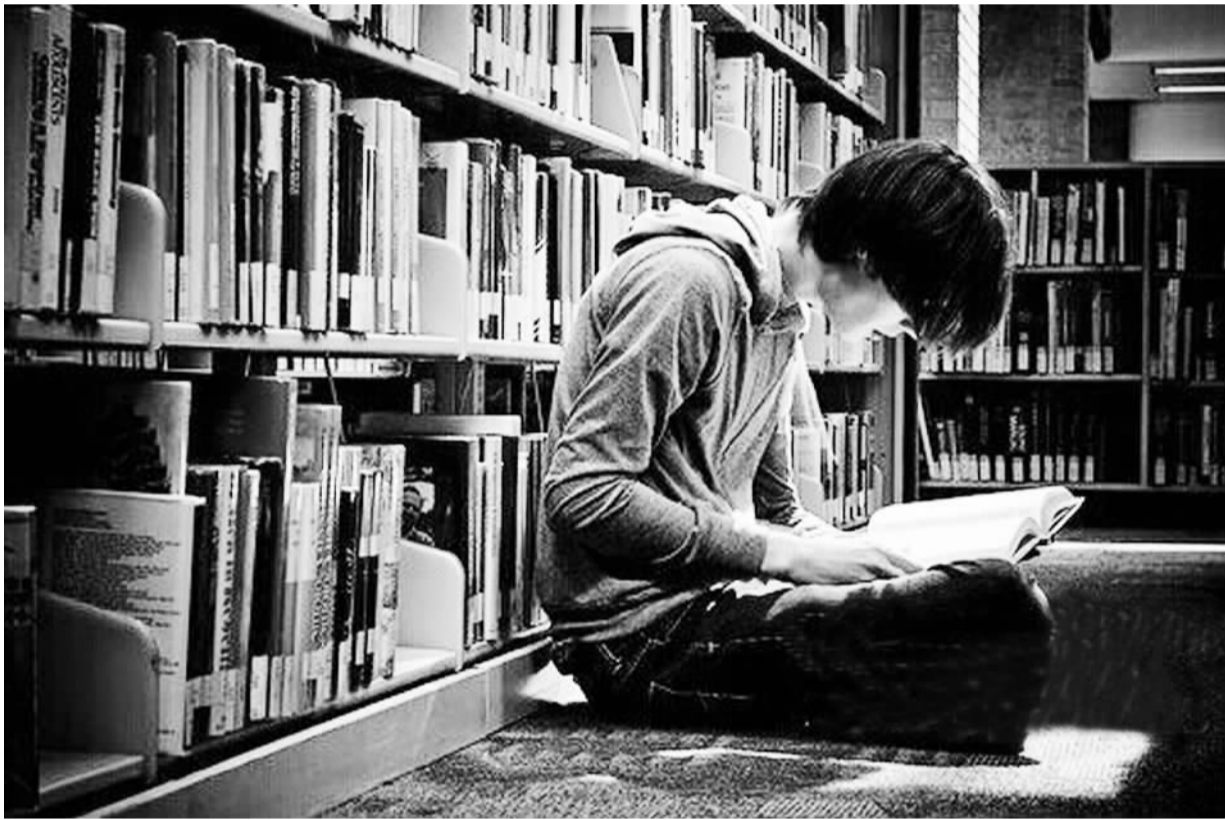
“买书的时候我会比较注意排版样式、封面的样式、书的大小，包括内页的行间距我都很在乎。”正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挑选图书的王女士表示。她是一家私营企业的员工，正在挑选情感类小说书籍。她认为，

阅读对自己来说是一种休闲方式，所以在内容以外，书籍的装帧设计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购买愿望。“我喜欢排版疏朗一点儿的设计，看上去不会觉得很累。而且一本书如果设计得很有美感、赏心悦目，我觉得会非常具有收藏价值。”

带着大黑框眼镜、穿着帆布鞋的“80后”武先生则表示，自己挑选书的时候，会很注意是哪个出版社出品的。武先生是某乐队的主唱，他说：“查了一下自己读过的书单，也挺惊讶的，我选择的书，80%都是广西师大、译文和三联出版社的。另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系列经典作品，我也很喜欢。”武先生认为，一个靠谱的出版社，基本上能保证图书的品质，这会大大降低自己挑选图书的时间成本。因为他个人也比较喜欢阅读国外作家的作品，所以他在挑选译文书的时候，也会更加注重翻译的质量，常会比较几个译本。如果有喜欢的译者，也会由此关注这位译者的其他翻译作品。

## “80后”购书旨在实用

“80后”一代人正在逐渐走进婚姻家庭，担负起更大的社会责任，所以在购买图书的选择上，多数“80后”的选择显得非常具有现实价值，他们更希望通过阅读掌握更多技能，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专注 (图片来源:百度)

# 《三国演义》的长与短

王兆军

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清人金圣叹，曾将我国的历史小说做了集萃式的评述，《三国演义》被排为“第一才子书”。

《三国演义》描写了东汉末年社会动荡、群雄逐鹿，魏蜀吴三国鼎立，最后归于统一的历史画面，场景宏大，情节复杂，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明珠。《三国演义》的作者具有非凡的叙事才能，详略张弛，纵横开合，都处理得极为恰当。其对几次大战的全景式描写，如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写得波澜起伏、跌宕曲折，读来惊心动魄，将简略的史实演义得生动细致，令人叹为观止。

《三国演义》刻画了近200个人物，个个堪称艺术典型。诸葛亮是“贤相”化身，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品质和神机妙算的奇异本领，出于圣贤而近乎神。关羽威猛刚毅、义重如山，被后人奉为神灵，即所谓圣人关老爷。书中有两位政治家是被脸谱化了的，一个是刘备，被塑造成为仁民爱物、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仁君典型；而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曹操，则被塑造成一位“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奸雄，一个野心家和阴谋家。鲁迅曾说，孔明被写得过于智慧而“近妖”，刘备则被写得过于仁厚而“近伪”。后人对此，已有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价。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称：“因为三国的事情，不像五代那样纷乱；又不像楚汉那样简单；恰是不简不繁，适于作小说。而且三国时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底材料。”《三国演义》在民间的普及和流传，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其接近于白话的文言，浅显易懂，稍微识些字的人就能阅读。

中国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前紧后松，下半部不如上半部精彩。《三国演义》是这样，《水浒传》《西游记》是这样，就连结构精美的《红楼梦》也是如此。这一点，和西方的长篇小说很不同，后者几乎都是结尾好，情节紧扣，高潮总是放在最后。《三国演义》的前33回，写了从桃园结义到曹操统一北方的24年，十分精彩。从刘备的三顾茅庐到诸葛亮死在五丈原的27年，也写得很好。而以后的46年，只用了15回半就草草收场，文笔也不怎么精彩。以西蜀为例，从六出祁山到九伐中原，一次不如一次写得好。

究其原因，不是中国小说家不懂得“高潮一过戛然而止”的道理，而是因为《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些故事，原本都来自元明的坊间说书人的唱本，一段一段的，罗贯中、施耐庵等作者将这些精彩的段落连接起来，首尾连接，次第贯串，在不失历史大致的前提下，将全部故事讲完整。于是，长篇虽然完成，但后边越来越松。

虽然如此，说书人和读书人还是喜欢的，前者可以根据他们的本子将整个故事讲个完整。此书一出，曲艺场中就多了一种说书人。这种人把长篇小说放在桌子上，一边说，一边一页一页地揭书，因为他们记不准情节，所以离不开书本，这种人被称为“揭张子”。可以这么说：罗贯中、施耐庵给了这些人混口饭吃的方法。至于读者，虽然觉得书的后部分情节稀松，但各种人物都一一见了始终，也算是如愿了。



品味古籍

# 常规，百岁老人的朴素认知

几又



今年1月，周有光先生111岁了。50岁前，他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教授；50岁至85岁，他是语言文字学家；85岁至今，他则成了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2015年4月住院期间，周有光对着屏幕说：“我年纪老了，(但)思想不老。”

思想是周有光的生命动力。《岁岁年年有光：周有光谈话集》(天津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出版)精选汇集了周有光百岁之后所思所想所虑，分为对谈和采访两部分，书中既有周有光对自己一生难忘经历的回顾，更有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对世界历史的走向、社会制度的变迁、国家未来发展的关注。无论是对自己人生的再回首，还是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思考，周有光并没有刻意导入渊博的知识，而是一次次试图通过个人所经历、所观察的百年历史相结合以得出朴素的结论：历史纵有千变万化，亦无法超越常规。

周有光这里所说的常规，与美国著名思想家托马斯·潘恩笔下的常识有着某些类同，均是历史反复试验经验的呈现。正因如此，百岁之后的周有光习惯用常规视角看待社会上的是是非非。周有光认为：文化发展纵然离不开种种历史因素，但总体上呈现竞争融合的大趋势。历史同时表明，文化从来不是豢养于高墙之内，而是需要在广阔的天地里淬火，接受时代

的洗礼。哪种文化包容性强，更有助于社会发展进步，哪种文化就可能发扬光大。所以，周有光反对简单化的文化“河东”“河西”说，认为“学问都是世界性的，是不分国家的”，也只有从世界看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才可能真正走向世界。

“要从世界来看国家，不要从国家来看世界”，这是周有光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古人有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视角不同结论自然有异。在周有光的语境里，世界视角代表人类社会发展潮流，顺此潮流，我们不仅看到世界发展的浩浩趋势，同时也可以清醒地看到自己所处的位置。虽然并不否认改革开放成就，但周有光仍指出，目前我们依然“落后惊人”，这种落后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依然过于粗放原始，还表现在人们对世界发展潮流认知的落后。

周有光先生反对单一的发展“模式”说，认为发展就是“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而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后发优势，无非是落后国家循着发达国家摸着石头过河逐渐形成的宝贵经验，这些经验恰恰是周有光一再提及的常规。

周有光的访谈内容相当广泛，而且并不是只做否定。对于一些人视若洪水猛兽的网络语言，作为语言文字学家，他反倒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大度，认为这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不宜过早评判，而应交给时间沉淀。他也不接受社会上关于知识分子“被收买”的指责，只是认为那是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而放弃思考。这种现象并非少数人的“专利”，而是社会的普遍“通病”。并且，知识分子不应成为社会上一个独立的层级，像美国“中产阶级已经占全国的80%，中产阶级都是知识分子”。

周有光谈论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他倡导的将所有问题放到常规层面分析解读的做法。面对这位经历百年历史风云的睿智老人，想必没有人会怀疑周有光是否有资格谈常规了吧。



# 《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丝路考古的奠基之作

朱玉麒

黄文弼(1893-1966)，20世纪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历史地理学家。

1927年，以斯文赫定为首的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黄文弼作为唯一的中国考古学者加入其中，开始了他终生从事的西北研究。他一生4次赴新疆考察，行程在3.8万公里以上，探查遗址数百，重点发掘数十，并有详略不同的记录。无论就其从事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时间之早、之长，还是就其考察领域之广、之深以及取得成果的丰硕程度而言，黄文弼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从事西北、新疆考古的第一人，中国考古学的先驱者。

黄文弼最早发表的成果，主要是吐鲁番盆地的考古收获。他的《高昌砖集》(1931年)和《高昌陶集》(1933年)，得到向达、郑师许等中国第一流学者的学术评价，他们断言“西北科学考察团之成绩在中文著述方面，目前不能不以黄君之收获为最大焉”(向达语)，称道作者的科学研究“既不自甘从汉人种西来陋说，又不迷信中国文化高于一切的怪论”(郑师许语)。

对于吐鲁番盆地的陶制品、砖瓦、文书，黄文弼的采集品自成系列，在他后续出版的《高昌砖集》增订本(1951年)、《吐鲁番考古记》(1954年)，都给予了出色的研究。他的《兽形足盆形象考释》《高昌疆域郡城考》《高昌国官制表》《高昌国麹氏纪年》《宁朔将军麹斌造寺碑校记》《张怀寂墓志铭校记》和《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等论文，奠定了高昌史研究的基础。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日本学术界著名的西域史专家水野清一、藤枝晃、石田幹之助等，都紧密跟踪黄文弼西域考古著作的出版，及时写出出色的书评在日本发布。对黄文弼《高昌陶集》的考古报告脱离中国古器物学的僵局而具有了科学考古学的面貌，水野清一由衷欢呼：“考古学渐渐被采用了其本来应有的面目形式，这是应该为中国考古学庆祝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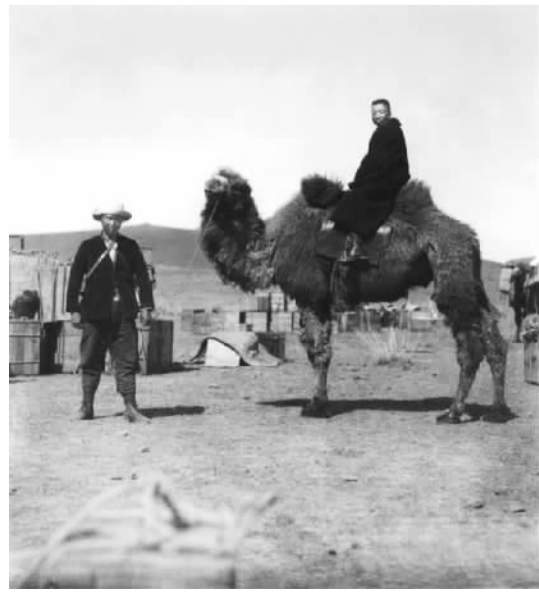
黄文弼的《罗布泊考古记》，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罗布泊地区研究的最早成果。结合土垠遗址汉简和考古遗址，黄文弼对西汉经营西域的职官、交通、仓储等方面，作出了新论，土垠遗址因此被认为是继楼兰古城之后罗布泊地区第二个最重要的发现。而对孔雀河南北两岸文化差异的揭示，对研究这一地区的孔雀河道、楼兰城址变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更体现了黄文弼在更大的区域内对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绿洲古国遗址的深入调查研

究成果。他对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库车、轮台、库车、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叶城、巴楚、喀什、阿克苏等地区的各类遗迹都做过详细的考察，并且从沙雅出发，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抵达于田，对沙漠腹地的河流和遗址做了细致的调查。他在焉耆、龟兹、于阗(今于田)等古国都城及重要遗址的研究中，发挥了熟悉传世文献的专长，从而与实地考察结合，做出了二重证据法的切实考证。

从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中亚探险与考察，一直是欧美和日本等东西洋各国的专利。黄文弼的成果，代表着中国学术界对新疆地区从事学术研究主权意识的觉醒。

2015年12月，商务印书馆以《西域史地考古论集》为书名，出版黄文弼先生的名篇选集，可谓西域史地考察与丝绸之路研究的奠基之作。此选本突出反映了黄文弼西北学术考察和研究方法论上的特色，一是对考古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多种学科的并重，二是对西北地区的遗址点考察与丝绸之路广阔区域面的有机结合，突破了清代西北史地学片面注重文献的局限，而获得了考古学实物的印证；而其考古遗址的个案调查，又得以在传世典籍中获得文献依据，取得了二重证据的相互印证。他考证丝绸之路交通和民族迁徙的论文，如《汉西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张骞使西域路线考》《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大月氏故地及西徙》《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等，都体现了黄文弼守正出新、开创西域研究局面的追求。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黄文弼骑骆驼在西北考察